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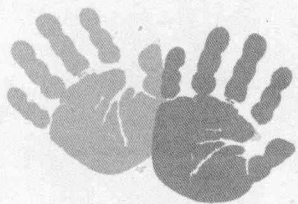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A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侯 颖 著

Ying Ho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

A Discussion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侯 颖 著

Ying Hou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儿童文学的教育性/侯颖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6

ISBN 978-7-5161-0801-7

I. ①论… II. ①侯… III. ①儿童文学—教育职能—文学研究—
中国 IV. ①I207. 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35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郭晓鸿
特约编辑 王冬梅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8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项目批准号：08JA751002）

◎ 东北师范大学“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行动计划优秀创新团队建设项目
“中国文化精神的形成与文学的发展”

目 录

引言 历史视阈下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	(1)
第一章 缪斯的诞生:儿童教育催生儿童文学	(12)
一 史前期儿童教育中的文学基因	(13)
二 发生期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的关系	(19)
三 教育思想对儿童文学的影响	(25)
四 “五四”时期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教育意识	(32)
五 学校教育中的儿童生命之殇	(45)
第二章 润物细无声: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表征	(53)
一 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与教育功能	(54)
二 民间童话对人类健康精神的构筑	(61)
三 儿歌对儿童心灵的守护	(67)
四 图画故事为儿童立体感知世界	(75)
五 成长小说在关键期肯定人生价值	(85)
六 儿童文学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95)

第三章 不堪的重负:教育主义重压下的儿童文学	(102)
一 教育本位的中国儿童文学	(103)
二 对教育主义儿童文学的批判	(110)
三 教育主义儿童文学的特征	(117)
四 名著中教育主义的局限性	(122)
第四章 回归本体:新时期儿童文学对教育工具论的颠覆	(130)
一 会议上对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的颠覆	(131)
二 理论上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论争	(136)
三 儿童文学从创作内容对教育主义的批判	(144)
四 儿童文学从创作形式对教育主义的否定	(156)
第五章 和而不同:新世纪儿童文学多元教育指向	(166)
一 儿童文学:人类文化精神的清澈溪流	(167)
二 教育成人:儿童文学的一种价值指向	(173)
三 生命教育:儿童文学的温暖之旅	(180)
四 复调的声音:“低龄化写作”对教育的颠覆	(188)
五 网络儿童文学:在反教育性中形成自我	(195)
第六章 主辅圆融: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	(205)
一 文学教育与语文教育的争鸣	(206)
二 儿童文学的语文教育价值	(212)
三 比较视野下的文学教育	(219)
四 新世纪语文教材中的儿童文学	(223)
五 语文教师的儿童文学素质	(241)

余论 童年绿洲:儿童文学教育的诗性品质	(250)
参考文献	(262)
附录 人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儿童文学作品改写情况	(269)
后记	(278)

引言 历史视阈下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问题

儿童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是客观而具体的，有儿童的独特性，但如何认识儿童的独特性和存在价值，却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的结果，儿童文学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

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尝试解决儿童观问题，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儿童是成人的预备；从传统伦理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是祛除顽劣人性的容器；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是建立健全人格的基础；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是一种国家未来的资源；从心理学上看，儿童心理是成人心理的基础；从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儿童是文化传承者；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儿童是可以定价的一种商品……从不同的角度看儿童，形成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

儿童观，可以说是儿童文学的原点。

所谓的儿童观，就是关于儿童的观念，或者是关于儿童的认识论。“并不是指孩子受到忽视、舍弃或受到轻视，它也不能混同于人们对孩子的情感。儿童的观念是与人们对儿童具有某种特殊的本性这样的意识相适应的，这种特殊的本质把孩子与成人区别开来。”^① 儿童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本性，儿童文学界

^① 俞金尧：《儿童史研究四十年》，《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对儿童本性的认识一直处于变化中，甚至存在着复杂的矛盾性，与之相关联的儿童文学也呈现不同的品貌。

现代教育家蒙台梭利认为“任何教育都是对儿童的惩罚”，她从儿童精神哲学的角度发现儿童对成人世界具有引领作用，并进一步强调这种作用是积极向上的，不是消极被动的负价值阻碍，是一种正价值引导。至于儿童的顽劣和不守秩序等行为，都是个体独一性和生命活力的表现，不是儿童整体性的精神品质，并把儿童的精神品质强化和放大，这种观点的提出，不止于对儿童群体的认识，也是对成人作为主宰的社会对儿童强权的一种强有力的抗争。

客观来看，儿童精神能够引导人类走向高级的文明，是指儿童精神中创造性、鲜活力、自然态的品性，但存在于儿童心理的原始而落后的东西，可能会被遮蔽，也会把儿童精神的丰富性、复杂性简单化和纯粹化，过于形而上学，在学理上有矫枉过正之嫌；但在情感上，正是蒙台梭利这样的教育家，对儿童精神品质的伟大发现，改变了儿童观和教育观，从而提升了对儿童个体生命的人道主义关怀，这种观念出现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亦是功利主义教育对儿童精神进行无情的侵害的时期，也是技术理性对人性过分压抑的时期，可以说，是一种积极浪漫的理想主义儿童观，其对人类教育观念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

按照历史文化学的观点，儿童观是人类文化发展历史的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斑驳的社会生活印记。文学是人学，作为儿童文学中的儿童，不应是简单的观点、理性和概念的总结，应该是渗透了丰富的人类情感的艺术形象，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多维的、立体的画面，可以触摸到文学世界中感性的儿童形象和丰富多彩的个性特征，甚至灵魂的深不可测和精神生活的绚烂多姿。如果把儿童的精神世界比拟成浩瀚的大海，那么，儿童文学只取了一壶浆一瓢饮，如冰山上的一角，人类对儿童精神生命的认知，就像探索生命的起源一样，永无止境。

中国的儿童观在近代社会以前，长期受到封建礼教的制约和成人世界话语

霸权的控制。两百多年前，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卷上说：“今虽至愚之人，悖戾恣睢，其处断一事，责诘一人，莫不辄曰理者，自宋以来始相习成俗，则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因以心之意见当之也。于是负其气，挟其势位，加以口给者，理伸；力弱气慴，口不能道辞者，理屈。”^①“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之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尤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②一方面看出了中国历史文化对人性的扭曲，“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③自宋朝以来“以理杀人”的虚妄之理，幼者（儿童）受到强大的成人世界的精神虐杀，“长者以理责幼”，“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儿童不能自己给自己创作作品，需要仰仗成人的赐予以得到精神生活的满足，同时成人在儿童文学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期望、思想和感情，儿童文学是成人对儿童的一种话语权力，有成人“挟其势位”的嫌疑。可见，在中国，儿童文学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门类产生出来是何其艰难。

中国儿童文学的教育主义有漫长的发展历史，源于“文以载道”和“言志”的传统。遭到“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先驱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批判。周作人在1923年6月21日《晨报》上发表的《儿童的书》一文中批评了那种“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那时期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理解是指文学作品对于满足和发展儿童精神、儿童心理、儿童审美意识及文学鉴赏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配合“一切革命的斗争”，儿童文学变成了实施爱国主

①（清）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10页。

③ 鲁迅：《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7页。

义和革命主义的教材，有的学者称之为“国家本位”主义的儿童文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儿童文学有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头八年，被有的儿童文学史学家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儿童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但延展了“国家本位”主义观念。朱自强先生认为，如果说“1957年以前，将儿童文学作为教育的工具的儿童文学观念，还给儿童文学作家留下了一定的发挥文学才能的空间的话”，那么，1957年之后，“儿童文学逐渐沦为政治思想和政治斗争的工具”。^①茅盾在《1960年少年儿童文学漫谈》一文中说：“1960年是少年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儿童文学创作歉收的一年。”贺宜在1959年的《文艺报》撰文《为达到少年儿童文学的新高峰而努力》，明确了把整个儿童文学作为“教育孩子们的工具”。大量的“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的作品充斥文坛。作为政治的传声筒，儿童文学变为一种教育的工具和手段。

“文化大革命”结束，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说受到了挑战，但坚信儿童文学是教育工具的作家和理论家还是不乏其人，例如鲁兵曾在1962年提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过了16年后的1978年5月，他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儿童文学就是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新一代，为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做出最大的努力。所以我还是这么说：‘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②

社会形势已经变化发展，儿童文学有了自身的品格，特定时期的文学观念无疑也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显示出局限性，这种固有的观念改变起来却极为艰难。

进入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界开始反思批判“儿童文学教育工具论”，周晓先生在1980年3月的《解放日报》上发表《儿童文学札

^① 朱自强：《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浙江少儿出版社2000年版，第306页。

^② 鲁兵：《教育儿童的文学》，少年儿童出版社1982年版，第7页。

记二题》一文，指出儿童文学的本质是文学，教育作用只是儿童文学的一种功能，要把儿童文学从狭隘的机械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伦理的灌输中解放出来。1981年刘厚明在《文艺研究》上撰文，将儿童文学的功能描述成“导思、染情、益智、添趣”。

随着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越来越重视，陈伯吹在《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一文指出：“文学的高贵处，不仅在于让读者全身心地获得愉快的美的享受，更重要的在于以先进的思想启示人生的道路，促使人作出道德范畴内的高尚行为，推动社会前进。”^① 引发了儿童文学教育问题的论争。

方卫平的《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并与陈伯吹先生商榷》一文，在肯定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前提下，指出：“把教育作用当成我们儿童文学观念的出发点，在客观上造成了儿童文学自身品格的丧失。”^② 刘绪源发表了争鸣文章《对一种儿童文学观的批评》，批判教育工具论，认为教育效果只能在审美之后产生，但审美的中介说，还是比较保守的文学教育观念的一种表达。^③

到了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更注重本体理论建设，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得到了新的阐释，在中国唯一的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杂志《儿童文学研究》上，展开了激烈的争鸣，大约有二十几篇文章来讨论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但都过于强调了文学与教育单方面的对峙，没有新的方法论出现，很难解决陈欠的问题，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就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公案。

1995年，汤锐的《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一书出版，有专门一节“再谈儿童文学的功能”，^④ 她认为作家主观创作上若以审美为主，作品客观上就可能起到教育的作用。教育的效果只能在阅读中产生，把教育性放在文学的接受

① 陈伯吹：《卫护儿童文学的纯洁性》，《解放日报》1987年6月4日。

② 方卫平：《近年来儿童文学发展态势之我见》，《百家》1988年第3期。

③ 刘绪源：《对一种儿童文学观的批评》，《儿童文学研究》1988年第4期。

④ 汤锐：《现代儿童文学本体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139页。

环节来谈，避开儿童文学本质的追问，这种崭新的视角有利于问题的深入，但是，作家创作时的教育理念，与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教育价值，以及作品在接受时读者所得到的教育效能，等等，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同年，孙建江在《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中，把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定为儿童文学中的一种思潮，^①模糊了文学的教育性是儿童文学的本质还是功能，并有否定文本的客观性之嫌，涉及文本的评判标准，谁来视文学为工具还是审美，可以说是文学的制度或文化管理问题，把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外化了。

儿童文学理论家朱自强先生把儿童文学的“教育性”视为具有文学自主性的“大写的教育”。^②给儿童文学教育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自主性教育的一个发展方向，反对学校的功利主义教育的思想。事实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文学教育，有时存在很大的交集，不能以一种教育的合理性来抵抗另一种教育的不足，它们之间很难相互替代，也不可能以不同侧面为中心向一个方向伸展，有时，不同的教育交互作用会形成完全不同的教育效果，甚至反其道而行之，儿童的成长需要多方教育的滋养。

以上种种关于儿童文学教育性的研究和探讨都是零星的，夹杂在一些儿童文学的著作中。新时期以降，国内儿童文学界第一部以专著形式探讨研究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论纲》一书（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2001年版），是辽宁师范大学马力等人的集体研究的成果，试图对儿童文学的教育价值进行理论的建构，但因为是集创作，研究力量不均衡，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儿童文学教育性的本质问题，只停留在对儿童文学教育价值的认识上。周晓波主编《当代儿童文学与素质教育研究》一书，大多从外部入手研究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阐释了儿童文学对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对儿童文学内部的本体性没有做学理的探讨。“关于儿童文学与教育关系问题在儿童文学理论界

① 孙建江：《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229页。

② 朱自强：《儿童文学的本质》，少年儿童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

长期众说纷纭、纠缠不清，这既反映了儿童文学界在理论思维能力方面的贫弱和理论思维品质方面的褊狭、固执的特点，同时也说明了儿童文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确实是儿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课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科学的研究和探讨。”^①

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纠结、模糊甚至歧义，影响了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很难产生被孩子普遍欢迎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更不用说像安徒生、格林兄弟、马克·吐温、JK·罗琳等世界级的儿童文学作家。中国的儿童文学还没有摆脱教育主义的束缚，儿童看到的文本掺杂着太多功利主义的硬结，读者往往觉得作品在批评和教训自己，有如芒在背的感觉，与内心隔得很远。王富仁先生曾谈到自己儿时看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感到自尊心受到强烈的伤害。在生活中，有一些成长烦恼和现实困顿的儿童，还要受到最应该使他们精神自由、快乐和幸福的儿童文学的谤刺，这是中国儿童文学让人感到悲哀之事。不是说，儿童文学不应该教育儿童，以及纠正儿童成长中的缺失和不足，等等。但事实上，作为审美的文学，叙事策略、故事趣味、情节构成、人物形象和语言艺术等也许更为重要。那么，如何正确认识和合理把握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进一步提升和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

再加上“作为儿童文学理论重要资源的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儿童哲学、童年史、民俗学等学科中，中国均没有原创性理论这一重要原因，我们的儿童文学研究、评论，在整体上还不尽如人意。”^② 这些原因阻碍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和创作实绩。

西方儿童文学的发展，也曾贯穿了教育主义的倾向，源于西方的“原罪论”，流传于十六七世纪的欧美儿童读物大多数是对儿童进行宗教道德教化。18和19世纪的一些儿童文学名著，也有宣扬上帝拯救人类的思想的说教倾

^① 方卫平：《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明天出版社2006年版，第324页。

^② 朱自强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的走向》，少年儿童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433页。

向，如瑞士女作家约翰娜·斯比丽的《海蒂》，就把主人公写成了“基督拯救人类派来的小天使”。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和想象这两种力量的平衡不断变动而引起的创作方法的冲突。以娱乐而不是以自我完善为目的，为了陶冶性情而不是增进文化知识的儿童文学往往发展较晚。教育性和想象性常被视为两种相反性质，但未必总是敌对的”。^① 这里，把教育性看成是与想象性相对的一种创作方法，既是儿童文学的目的又是儿童文学的手段，混淆了本质与功能。

进入 20 世纪以来，儿童文学的审美教育越来越受到普遍的重视，加拿大培利·诺德曼在为大学教育系和英文系撰写的《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一书认为，儿童是审美经验缺乏的人，绝不是审美能力低下的人。阅读儿童文学可以给儿童带来 20 种乐趣，如“文字本身的乐趣”，“引发我们情绪的乐趣”，“运用我们的诠释系统以及理解策略的乐趣”，等等，而这种种乐趣可以归纳为一些基本的乐趣：“加入与他人沟通的行动；回应故事或图画就是在和表达不同人格或经验情趣的文本交流；而和他人谈论我们体验过的文本，则是不同心灵的交流，我们靠阅读文学来体验自己以前不知或不熟悉的想法和经验。”^② 他进一步指出：“儿童文学虽然也都以情节为主，却极少不夹带道德或情绪上的评论；儿童文学主要驱动力就如我所说都是教育性的，童书作家在描写冒险故事和一般的故事时，几乎都希望角色和读者把重心放在刺激情节的道德或情绪上。”^③ 这种观点以读者的反映论为基础，对儿童文学的经典文本做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和探讨，强调了儿童文学的教育意义，但过于强调文本道德的承载和读者的阅读兴趣，缺乏对文本潜在教育性的深层探讨，文学作品的选择出现了

① 转引自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6 页。

② [加拿大]培利·诺德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刘凤芯译，（台北）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 2000 年版，第 37 页。

③ 同上书，第 38 页。

一种人为的规定性，容易滑入内容大于形式的文本价值指涉中，阅读的效果旨归到思想道德的层面，不能涵盖文学世界的丰富内蕴。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贝特尔海姆的《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①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深入探讨了流传长久、影响广泛的民间童话，强调了民间童话在人类童年期对形成健康精神品格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根据“复演说”的观点，民间童话无论到什么时期，都有健全人类人格品质的作用，具有荣格所说的“原型”的力量，并将永远伴随人类发展下去，是人类的精神生活之根。雪登·凯许登的《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②一书，认为民间童话故事中的巫婆代表了沉潜于儿童心底的“七大罪”，如虚荣、贪吃、嫉妒、色欲、欺骗、贪婪与懒惰，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罪恶，在儿童成长中衍生为复杂的心理冲突，仿佛上演着一场场“心理剧”，阅读童话故事就是心灵的历险，童话中巫婆被杀死的过程就是儿童战胜“罪恶”的过程，也使内心冲突得到平复，并获得心灵与道德的成长。这种研究对心理学和文学都具有启发性，但基于童年罪恶的观点，一是西方宗教原罪说的心理学表达，二是人性本恶观的一种“童话化”异形表述，是现代社会应该警惕的一种儿童观。

这些研究视角对儿童文学理论的提升具有启发性和比较重要的意义。童话是儿童文学中最具本质性的文体，所反映的儿童生活和精神世界丰富多彩，经过漫长的口耳相传的历史，加之不同地区不同时代往往具有惊人相似的童话母题，民间童话在传播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接受者的再创作，确乎接近人的心理欲求和审美习惯。无论在审美教育中，还是在心理学的效用，都是人类文化的丰硕成果。但是，在儿童文学进入“被资源化”的研究过程中，也会淹没文学的本体价值和自觉性，更不用说，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儿童的生命个体尽管携

① [美]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永恒的魅力——童话世界与童心世界》，舒伟等译，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 [美] 雪登·凯许登：《巫婆一定得死——童话如何形塑我们的性格》，李淑珺译，台北张老师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版。

带着人类“原始社会童年期”的一些色彩，具有类与族的共性。但实际上，儿童生命个体千差万别，他们除了具有“典型性”，裹挟的文化基因和个体的生命力有“这一个”的独异性和创造性，儿童文学的发展容易被这种“古已有之”的思想所遮蔽。从这一角度来审视，这些理论视界与其说是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收获，不如说是心理学、成功学和精神分析学等对童话的一次次巧妙利用，兼有儿童文学教育性泛化的嫌疑，也容易陷入一种为心理而心理，为分析而分析，为精神而精神的理性主义的虚空中，从而破坏了文学情感的丰富性和艺术的美感质素，需要进一步甄别检视。

坦言之，儿童文学理论界对儿童文学教育性与文学性论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有相当一部分成人存在着对儿童认识的固化、简化与偏颇，即儿童观、人性观和价值观的问题，认为儿童各种能力低下，尤其是儿童审美能力不如成人，对儿童这一文化群体缺少本质的认识 and 把握，因此，儿童文学界容忍了一批缺少责任感、道义感和敬畏感的作家，也容忍了大量成人不愿意看、儿童看不懂的平庸作品之存在。实际上，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认识，关系到儿童文学的本质和学科主体性确立的问题，更关系到儿童文学自身品质的提升，以及对儿童健康精神成长的影响。

广义的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具体的教育是指对人进行知识技能等的训练。教育的范围包括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等。文学教育是形而上的教育，是通过审美的过程来影响人，儿童文学因为是成人创作的文学，在作品中包含了成人对儿童一定的期待，这种期待如果与儿童情感精神交流相联系，就会促进儿童文学的发展，反之，可能会阻碍儿童文学的脚步。

既然文学可以帮助儿童感性地自由地认识世界，充分展示心灵，丰富想象，充实自我，儿童文学作为人之初的文学，它的教育性尤其不能忽视。纵观文学发展的历史，过分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性，造成了文学品格的丧失，变成了教育主义的文学；消解儿童文学的教育性，形成了荒诞的不被儿童理解和接受的文学，成为艺术而艺术的玄美之物。这两种倾向都是对儿童文学教育性的